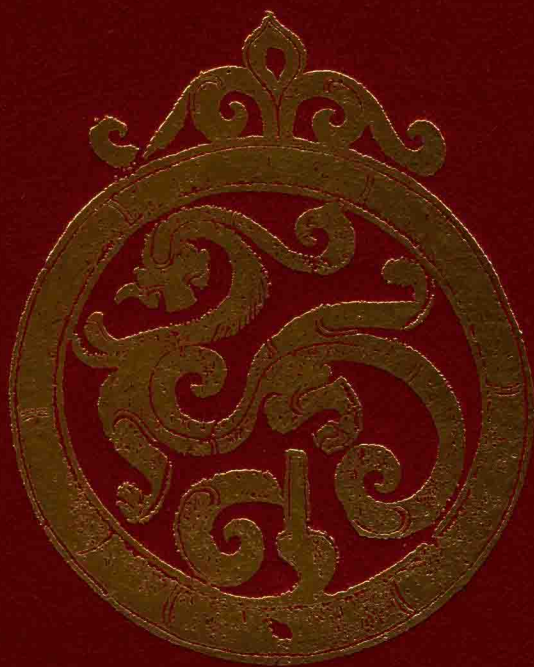


秦汉考古与秦汉文明研究

白云翔 著



◎ 文物出版社

秦汉考古与秦汉文明研究

白云翔 著



文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秦汉考古与秦汉文明研究 / 白云翔著. --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9. 10

ISBN 978 - 7 - 5010 - 6306 - 2

I. ①秦… II. ①白… III. ①秦汉考古 - 研究②文化
史 - 研究 - 中国 - 秦汉时代 IV. ①K871.414②K23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17278 号

秦汉考古与秦汉文明研究

著 者: 白云翔

责任编辑: 崔叶舟

责任印制: 苏 林

封面设计: 程星涛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邮 编: 100007

网 址: <http://www.wenwu.com>

邮 箱: web@wenwu.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8.75

版 次: 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0 - 6306 - 2

定 价: 350.00 元

本书版权独家所有, 非经授权, 不得复制翻印

Studies on Qin and Han Archaeology and Qin and Han Civilizations

By

Bai Yunxiang

目 录

导 言	1
秦汉考古理论与实践的若干问题	8
秦汉考古的主要课题及其展望	17
中国古代大型墓葬墓主人判定的理论与实践 ——以曹操墓等汉代王侯陵墓为例	28
论基于风格与分布的考古遗物产地推定法	49
秦汉时期聚落的考古发现及初步认识	67
战国秦汉时期瓮棺葬研究	81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概述	114
汉代积贝墓研究	134
西汉王侯陵墓考古视野下海昏侯刘贺墓的观察	155
秦汉时期的农业	169
秦汉时期的铜器与铜器制造业	233
秦汉时期的铁器与铁器工业	270
汉代临淄铜镜制造业的考古学研究	307
汉代“蜀郡西工造”的考古学论述	345
秦汉时期的铁钱币和度量衡器概论	367

汉代尺度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	379
考古发现与秦汉时期的体育活动	394
论汉代人身生活中的鱼和观念中的鱼	416
从里耶古城论秦汉物质文化的统一性与地域性	436
从北京大葆台汉墓论汉代物质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448
汉代：开启国门 走向世界	464
汉式铜镜在中亚的发现及其认识	473
汉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考古学观察	486
三韩时代文化遗存中的汉朝文物及其认识	505
从韩国上林里铜剑和日本平原村铜镜论中国古代青铜工匠的两次东渡	536
战国秦汉和日本弥生时代的锻釜铁器	555
考古学所见战国秦汉时代/弥生时代的中日文化交流及关系	572
岭南地区发现的汉代舶来金银器述论	591
附录：秦汉考古与秦汉文明研究论著存目	606
后 记	609

Contents

Introduction	1
Some Issues o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the Qin and Han Archaeology	8
The Main Research Topics of the Qin and Han Archaeology and Their Prospects	17
The Theory and Practices on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Occupants of the Large-scale Burials of Ancient China	28
On the Provenance Study Method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lics Based on the Styles and Distributions	49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s of the Settlements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67
A Study of Urn-burial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the Qin-Han Times	81
A Summary on the Terracotta Army Pits of Emperor Qin Shihuang's Mausoleum	114
The Study on the Shell-stacked Burials of the Han Dynasty	134
The Observation on the Tomb of Liu He, the Marquis of Haihun, in the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of Burials of the Feudal Lords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155
The Agriculture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169
The Bronzes and Bronze Industry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233
The Iron Objects and Iron Industry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270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Industry of Bronze Mirrors in Linzi during the Han Period	307
Archaeological Discussion on "Made by Xigong Department of Shu Prefecture" of Han Dynasty	345

Introduction of the Qin and Han Period Iron Coins and Metrological Objects	367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Relevant Issues of Rulers of the Han Dynasty	379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Qin-Han Period Sports and Games	394
Fish in Han China: Aesthetic, Symbolic, and Culinary Aspects	416
On the Uniformity and Regionalism of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in the Light of the Liye Ancient City Site	436
On the Uniformity and Diversity of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Han Dynasty in the Light of the Western Han Tomb at Dabaotai in Beijing	448
 The Han Empire: Opening the Door and Embracing the World	464
Discovery and Identification of Han-style Bronze Mirrors in Central Asia	473
The Archaeological Observat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r	486
The Artifacts of the Han Dynasty in the Cultural Remains of the Samhan Period and the Understandings to Them	505
The Two Eastward Migrations of the Bronze Craftsmen in Ancient China Seen from the Bronze Swords Unearthed at Sangnim-ri Site in Korea and the Bronze Mirrors Unearthed at Hirabaru Site in Japan	536
Forged-socketed Irons of the Warring States, Qin and Han Periods, China and Those of the Yayoi Period, Japan	555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Yayoi Period Seen through Archaeology	572
On the Imported Gold and Silver Objects in the Han Dynasty Found in the Lingnan Region	591
 Appendix: List of the Essays of the Studies on Qin and Han Archaeology and Qin and Han Civilizations	606
 Postscript	609

导 言

秦汉时期（公元前 221 ~ 公元 220 年）作为帝国时代的第一个发展高峰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代。公元前 221 年，随着秦统一六国，东周时期诸侯割据的局面走向终结，一个多民族统一的、以郡县制为政治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由王国时代演进到帝国时代。公元前 206 年建立的西汉王朝以及后来的新莽、东汉王朝，继承并发展了秦王朝建立的一整套社会制度，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以其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并对后来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和深远的历史影响。正因为如此，秦汉时期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为整个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世界考古学上也具有重要地位。

20 世纪初以来，伴随着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萌芽、诞生和逐步发展，在一代又一代考古人的艰苦努力下，秦汉时期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不断取得丰硕成果，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内涵，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繁荣和秦汉社会历史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学术影响。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之下，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秦汉考古逐步成为笔者学习和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并且不断有所收获。三十年过去了，作为秦汉考古耕耘之路的一种梳理和阶段性总结，从迄今在国内外发表的论著中选取部分文章辑作《秦汉考古与秦汉文明研究》出版，以更好地跟国内外的师友们交流。

本文集收录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及讲演稿共 28 篇，主要涉及秦汉考古的理论和方法、秦汉考古基本课题研究、秦汉文明及社会生活研究等，根据其内容大致分为五组。

第一组是有关秦汉考古理论与方法方面的论述，共4篇。

无论是学科的发展还是学者个人的研究，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和科学的方法，而理论和方法都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提出和丰富的，都是随着学科的发展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秦汉考古也不例外。

《秦汉考古理论与实践的若干问题》，基于秦汉考古的实际并从历史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出发，系统而简要地讨论了秦汉考古的基本任务及其特点、文化分期、文化分区、地层学和类型学的应用、“历时性”与“共时性”以及“类比性”、边远和少数族地区考古等问题。文中特别强调，秦汉考古的主要任务和研究的重点，是“物质文化的研究、精神文化的物化研究和社会生活的具象化、实证化研究”。这实际上也是整个历史考古学的主要任务和重点。《秦汉考古的主要课题及其展望》，则就秦汉时期的城市与聚落考古、墓葬考古、物质文明研究、精神文明研究、政治文明研究、社会生活研究等主要课题的现状和前景等进行了总结和思考，被认为“对秦汉考古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性意义”^①。

2009年12月底，曹操高陵（安阳西高穴大墓）被发现并被发掘的消息公布，受到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旋即引起了西高穴大墓是否曹操墓的争论，并且迅速演变成一个全民关注的“文化事件”。2010年1月26日，我在《光明日报·理论周刊（史学）》发表了署名文章《安阳西高穴大墓是否为曹操高陵之争的考古学思考》，试图从学理上说明西高穴大墓最大可能就是曹操墓，以回应社会的关切。《中国古代大型墓葬墓主人判定的理论与实践——以曹操墓等汉代王侯陵墓为例》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写成的，系统阐述了考古发现的古代大型墓葬墓主人判定的“三要素”法，即“基本方法是根据考古发现并结合文献记载，通过时间要素、空间要素和特定要素的分析以及这三个要素的互补互证”。

考古遗物的产地研究，是考古学界长期关注的课题之一。因为，考古遗物的产地研究，在考古学研究中尤其是根据考古资料阐释古代人群移动和人员往来、社会经济生活、各地之间的联系和文化交流、文化变迁和古代交通等问题的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而考古遗物产地研究的方法需要不断丰富和完善。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并根据20世纪末以来山东临淄齐故城汉代镜范、汉代临淄铜镜生产和流通等研究的实践，笔者总结提出了“产地形成风格、流通决定分布，根据考古遗物的产地风格和考古遗物的地域分布状况，从而推定这种考古遗物的密集分布区就是其产地所在”

^① 高崇文：《读〈中国考古学·秦汉卷〉》，《考古》2012年第8期。

的“基于风格和分布的考古遗物产地推定法”。《论基于风格与分布的考古遗物产地推定法》，对这种方法及其提出和应用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二

第二组是有关秦汉考古基础性研究方面的论述，共5篇。

城市和聚落既是田野考古的主要对象，也是考古研究的基本内容之一。《秦汉时期聚落的考古发现及初步认识》，在对考古发现的秦汉时期的聚落进行系统梳理基础上，就秦汉聚落的选址、布局结构、宅院住居及其他生活设施、经济生活及其类型等进行了考察，提出并讨论了秦汉聚落布局结构的“聚集式”和“散点式”两种形态，以及秦汉聚落的“农业型”、“工商型”和“农工商混合型”三种经济生活类型。

墓葬作为人们埋葬死者的设施和实物遗留，是当时丧葬制度、丧葬礼仪、丧葬习俗及丧葬活动等考古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因此，墓葬同样既是田野考古的主要对象，也是考古研究的基本内容之一。秦汉时期作为中国古代墓葬的大转折、大发展时期，无论其数量之庞大还是种类之繁多，都可谓空前绝后。其中，以埋葬儿童为主体的瓮棺葬、以贝壳作为填埋物的积贝墓，不仅是当时颇具特色的两种墓葬类型，而且在分布上也颇具地域特色。《战国秦汉时期瓮棺葬研究》和《汉代积贝墓研究》，首次对战国秦汉时期这两种墓葬的类型、特征、年代、分布及其流变等进行了系统考察，同时为当时环黄海/渤海地区乃至东北亚各地之间的人群移动和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西汉王侯陵墓考古视野下海昏侯刘贺墓的观察》，是在刘贺墓被发掘后引起世人关注的背景下、以学术讲演稿为基础增删修订而成的。该文在简要梳理刘贺墓资料并与西汉诸侯王陵和列侯墓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主要就刘贺墓作为西汉列侯墓的一般性和独特性进行解读，认为“集列侯墓、诸侯王气势和废帝心结于一体，构成了海昏侯刘贺墓的多重性格和总体特征”。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概述》，是应澳门国际研究所之约为《葡语国家与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葡萄牙语版）一书而撰写的一个章节。该文虽然标题内容为“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但实际上是以兵马俑坑为主、对整个秦始皇陵的简明叙述，强调“秦始皇陵并不仅仅是一座皇帝陵墓，而是有着壮丽的陵园和复杂的陪葬系统。它由地宫和封土、陵园、陵寝建筑、众多的陪葬墓和丰富的陪葬坑等组成”；“作为帝陵的重要组成部分，陪葬坑在秦始皇陵中不仅数量众多、分布密集，而且形制多样，内涵极为丰富，兵马俑坑就是其中之一”，以便读者能够比较完整、准确地理解兵马俑坑，同时对秦始皇陵有一个比较全面、完整的认识。

三

第三组是有关秦汉时期社会生产方面的论述，共5篇。

社会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物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商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①。作为以实物资料研究人类古代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考古学来说，社会生产不仅是最基本的研究内容之一，而且具有独特的学科优势，而作为历史考古学的秦汉考古，更是如此。

农业是古代社会的两大生产部门之一、三大经济领域之一，并且“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②。古代中国是以农业立国的国家，而秦汉时期又是我国传统农业的第一个发展高峰期。《秦汉时期的农业》基于考古发现的丰富的农业活动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粮食作物、农耕工具与农耕技术、粮食加工、粮食贮藏到农田水利与灌溉、农业生产中的多种经营等，进行了系统的综合性论述，从考古学上比较全面地揭示了秦汉时期农业的发展状况及其时代特点。

手工业同样是古代社会的两大生产部门之一、三大经济领域之一，不仅是生产资料的主要生产部门，同时也是生活资料的主要生产部门。秦汉时期作为我国历史上帝国时代的第一个发展高峰时期，手工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成为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秦汉时期作为发达的铁器时代，是中国古代铁器和铁器工业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时期，钢铁技术和铁器工业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和发展水平；与此同时，铜器虽然已经失去了它在青铜器时代居于文化中心的地位，但铜器制造业仍然是当时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并且仍然具有相当的规模。《秦汉时期的铜器与铜器制造业》和《秦汉时期的铁器与铁器工业》作为综合性论述，前者从秦汉铜器类型的梳理入手，比较系统地讨论了当时日用器皿和铜镜的类型及其演变，进而重点就秦汉铜器的制造与生产、秦汉铜器的时代特点及其历史地位进行了深入考察；后者在系统梳理秦汉铁器类型及其特点的基础上，重点就秦汉时期铁器应用的扩展、铁工场址的发掘和研究、钢铁技术及其发展水平、铁器生产的经营管理等进行了深入考察。由此，比较系统地从考古学上揭示了秦汉时期铜器制造业和铁器工业的发展状况，以及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为秦汉手工业考古的个案研究，共收录2篇论著。《汉代临淄铜镜制造业的考古学研究》，基于此前对临淄齐故城出土汉代镜范、铸镜作坊址调查以及汉代铜镜的比较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中文版，第424页。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中文版，第146页。

研究,从手工业考古的理念出发,就汉代临淄的铜镜制作技术与铜镜生产、铜镜产品类型与特色及其流通等进行了系统考察,不仅比较全面地揭示了当时临淄铜镜的生产及其流通状况,并且初步究明了汉代的铜镜铸造技术。《汉代“蜀郡西工造”的考古学论述》,作为汉代工官研究的一次尝试,基于带有“蜀郡西工”铭刻的器物的系统梳理和研究,分别讨论了当时蜀郡西工的漆器制造、铜器制造和铁器制造,进而就蜀郡西工的设立、生产管理和产品流向等进行考察。据此,一方面比较完整地揭示了蜀郡西工的面貌,另一方面也为认识汉代工官打开了一扇窗户。

四

第四组主要是有关秦汉时期社会生活和物质文化方面的论述,共6篇。

社会生活的具象化、实证化研究,即从社会生活的角度发掘和梳理考古资料,对其各个方面进行具体的、形象的和实证性的说明和阐释,是历史考古学的主要任务之一,秦汉考古也不例外。社会生活的内容十分广泛,既包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更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而社会生活的考古学研究,更强调日常生活的研究。

度量衡器既与商品交换等经济生活密切相关,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秦汉时期度量衡器的材质多样,有铜、铁、石及骨质等多种。《秦汉时期的铁钱币和度量衡器概论》,就当时少见的铁钱币和比较常见的铁度量衡器进行了系统的收集和整理,进而分别讨论了铁钱币和铁度量衡器的出现和使用等问题。《汉代尺度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对1990年以来考古新发现的汉代尺度实物资料进行了全面的收集和整理,进一步论证了西汉和新莽时期的一尺为23厘米、东汉时期的一尺为23.4厘米,同时讨论了汉代尺度虽有法定量值但在实际应用中多有差异、尺子宽度也具有一定规制、尺子装饰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差异、墓葬中尺子随葬的女性特点等问题,并特别讨论了考古学研究中需要有科学的“尺度观”等问题。

体育及游艺活动,既是古代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人们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考古发现与秦汉时期的体育活动》,着眼于秦汉时期在中国古代体育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从考古学上分别就蹴鞠、武术、马术、角抵、棋类、投壶等体育和游艺活动等进行考察,进而讨论了秦汉时期体育活动实用性强、表演性和观赏性强、娱乐性强等时代特点。

《论汉代人生活中的鱼和观念中的鱼》,根据考古发现的鱼形器具、器物上的鱼类造型、器物装饰和绘画中的鱼图像以及居址和墓葬中鱼的实物遗存等,综合考察了汉代人在社会生活中对鱼的利用以及鱼与汉代人精神活动的联系。这种研究,将有助于了解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认知,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秦汉物质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是笔者多年来一直关注和思考的课题之一。《从里耶古城论秦汉物质文化的统一性与地域性》和《从北京大葆台汉墓论汉代物质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就是对秦汉时期物质文化之统一性和多样性的个案研究。在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背景之下,基于国家的大一统,文化上也表现出强烈的大一统局面。但是,由于各地自然地理环境、聚居人群及其观念、文化传统及社会风尚、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各地的文化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宏观上的统一性和微观上的地域性及多样性,构成秦汉时期物质文化乃至整个秦汉文化的总体格局。因此,统一性和地域性及多样性,无疑是我们审视和把握秦汉文化即秦汉文明的两个基本点。

五

第五组是有关秦汉时期中外交流方面的论述,共8篇。

不同人群之间的交往和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在人类文明的发生、发展和演进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助力作用,无疑也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虽然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乃至遥远的史前时代,但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真正同世界上发生联系,是从汉代开始的。《汉代:开启国门 走向世界》,基于对中亚、西亚、蒙古及西伯利亚、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中南半岛等地发现的汉朝文物以及汉式器物的简要、系统的梳理及比较研究,提出并阐述了“走向世界是汉代中外交流的主旋律”,以及汉王朝和汉文化走向世界的历史渊源、时代背景、方式与途径、交通线路以及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和影响。

汉王朝同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交流的分区域研究,是从总体上考察汉代中外交流的基础。《战国秦汉和日本弥生时代的锻釜铁器》《考古学所见战国秦汉时代/弥生时代的中日文化交流及关系》《汉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考古学观察》《三韩时代文化遗存中的汉朝文物及其认识》《从韩国上林里铜剑和日本平原村铜镜论中国古代青铜工匠的两次东渡》和《汉式铜镜在中亚的发现及其认识》等,分别考察了秦汉时期乃至战国时期中国同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以及中亚地区的联系和交流,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当时中国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尤其是中国大陆文化向周边地区的扩散及其历史影响。

尽管秦汉时期中外交流的主旋律是汉王朝和汉文化走向世界,但人群间的交往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毕竟是双向的,秦汉时期亦然。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在汉文化经由南海向南亚、继之向西亚等地扩散的同时,产自南亚、西亚甚至更遥远的地中海地区的物产也通过海上贸易路线传入到汉帝国境内。《岭南地区发现的汉代舶来金银器述论》,就岭南地区考古发现的金银器中的舶来品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并

考察了其原产地及其传入中国的路线，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岭南地区作为汉代海上中西交流之路的出发地，在当时的中西交流中发挥了‘前沿阵地’和‘桥头堡’的作用”。

六

上述 28 篇论述，主要是从创新性、综合性和代表性以及篇幅适当等方面考虑而选定的。就学术研究而言，无论是某一问题的个案研究还是某一方面的综合研究，都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积累和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有些论述虽然未收录本文集，但实际上与已收录的文章有密切的联系。譬如，与汉代临淄铜镜铸造业相关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还有《西汉时期日光大明草叶纹镜及其铸范的考察》《山东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发现与研究》和《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及相关问题研究》等；又如，《关于环渤海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瓮棺葬的若干问题》和《公元前一千纪后半环黄海地区的瓮棺葬及其历史文化阐释》等，则是战国秦汉时期瓮棺葬研究的深化和扩展；再如，《汉王朝与汉文化走向世界的考古学解读》，对汉代中外交流尤其是汉文化向周边地区的传播和扩散，有着更为详细的论述。至于《汉长安城手工业生产遗存的考古学研究》，作为城市手工业考古研究的一次尝试，是汉代城市考古以及手工业考古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考虑到篇幅过长而未予收录。为此，将未收录本文集的 38 篇论著整理成《秦汉考古与秦汉文明研究论著存目》一并附录于书末，以供查阅和参考。

学术的发展有时代性和局限性，同样地，学者的研究也无法避免其局限性，任何一种论著都是阶段性成果，都会随着材料的增多、方法的进步和研究的深入而需要修正和完善。考古学研究尤其如是。本文集收录的论著，同样都或多或少带有局限性，甚至是错漏和谬误。文章中的地名，也不因行政区划的调整而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和地名进行统一。

尽管如此，作为笔者从事秦汉考古学习和研究的阶段性回顾和梳理，为了客观记录当时的所思、所想、所论，收录的论著除了编辑成书的需要做必要的技术处理之外，从题目、内容、观点、材料、方法到结论及其图表和文字表述等，一概保持原貌，未作任何修改和补充。敬请学界师友和读者朋友们理解。

秦汉考古理论与实践的若干问题

秦汉考古的发生和发展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道路，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对秦汉考古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全面总结之际，就其理论和实践的基本问题进行探讨和说明，是必要的。

一 关于秦汉考古的基本任务及其特点

秦汉考古属于历史考古学，而历史考古学有别于史前考古学的根本特征之一是出现了文字和文献记录。各种历史典籍，对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记述，尤其是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历史人物和事件，以及思想文化等，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社会发展之大势等已经基本明了。因此，夏鼐等指出：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两者的研究任务也有所不同。史前考古学承担了究明史前时代人类历史的全部责任，而历史考古学则可以与历史学分工合作，相辅相成，共同究明历史时代人类社会的历史”^①。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并结合历史考古学的实践，近年来笔者多次指出：“历史考古学相对于史前考古学而言，具有两个最鲜明的特征：其一，是必须与文献记载相结合；其二，是主要任务和研究的重点发生转移，即转移到物质文化的研究、精神文化的物化研究和社会生活的具象化、实证化研究”^②。从文明史的角度讲，这里的“物质文化”即“物质文明”，“精神文化”实际上是“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总称。

就秦汉时期而言，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已经相当丰富，无论正史、别史、杂史还是文学作品等，都对当时的社会历史有着各种各样的记述。正因为如此，秦汉时期的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17页。

^② 白云翔：《汉代临淄铜镜制造业的考古学研究》，《探古求原——考古杂志社成立十周年纪念学术文集》，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36页。

改朝换代乃至皇帝的更替、重大历史事件的年代等时空记载较为明确，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活动与事件等多有涉及。但毋庸讳言，历史文献也有着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即编写者自身的时代与地位的局限性影响了历史文献的科学性。由于古代社会的历史学主要是为国家统治服务的，因而其大多重政治史、重制度史，而轻经济生活史和社会生活史；对历史大人物和历史大事件的记述重彩浓墨，而对人民大众及其生产和生活则轻描淡写；对当时的社会历史多宏观性、总体性和概括性的记述，而少微观性、具体性和个案性的描述等。况且，历史文献都是当时或后来人的著述，经过了撰写者人为地加工和取舍，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和撰写者的烙印。正因为如此，历史文献虽然丰富，但真正全面揭示秦汉时期的社会历史，秦汉考古学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科学意义。因此，我们在研究的实践中，一方面，应当充分重视和利用历史文献，自觉地做好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的有机结合；另一方面，从历史考古学的性质、任务及其特点出发，根据考古资料，运用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手段，对秦汉时期的社会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古学研究，如城市及城市生活的研究，社会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研究，科学和技术的研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研究，埋葬制度及丧葬习俗的研究，社会意识和精神信仰的研究，中外之间和国内各地区之间文化交流的研究，人们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及行为方式的研究等。唯有如此，秦汉考古才能在秦汉社会历史和秦汉文明的全面揭示及深入研究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 关于秦汉考古的文化分期

考古学作为研究历史的一门科学，“时间”是其基轴之一，即任何时代、任何地区、任何问题的考古研究都离不开“时间”这个轴线，即考古学的断代、分期和编年问题。秦汉考古亦然。

前已述及，历史文献构建的秦汉时期的年代学框架，为秦汉考古的断代和分期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依据，但它并不能完全代替考古上的年代学研究。因为，王朝的更替与物质文化的变迁并不完全同步，而是有一个“时间差”；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实物资料，而实物资料除了其自身有明确的铭刻年代之外，无论遗迹还是遗物，都存在着一个考古学断代问题。实际上，考古学界始终在进行着考古断代和分期的实践。关于秦汉考古的断代问题，后文将会详细讨论，这里仅就秦汉考古的分期进行说明。

关于秦汉考古的分期，考古界已经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并且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认识，但又往往是因人而异，或因地而异，或因问题而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看，秦汉考古的分期有两个基本的原则：一是以历史纪年为依据；二是从考古资料所反映的物质文化变迁的相对年代的实际出发。基于这样的认识，整个秦汉时期似可分为以